

一位80后尿毒症患者的 医保样本

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

阅读提要

■“我爸为了给我治病，能卖的全卖了，包括刚种好的树苗、还没长大的猪。2010年的每月5000块钱，依然是个天文数字。”李存希在记者面前，用双手画成一个圈儿，比划着被父亲卖掉的树苗的粗细，然后说了句：我爸现在要是还在，得多好。2014年，尿毒症患者透析报销比例提高到50%以上。到如今，李存希的治疗费用可以报销到85%，每次自己只需要花不到100块钱，加上口服药，每月费用能控制在1000多块钱。



除了每周三次、一次四小时的透析，李存希还需要每天服药，卧室桌子上摆放着他的药品。
 张赫摄

■13年前，我国80%以上的尿毒症患者因经济条件所限不能接受血液净化治疗，如今，已经变成了患者接受透析治疗可以实现兜底，80%以上的进行报销。患者和家人都迎来了政策推动下的希望的春天。放眼望去，如今能有医保报销外加各类补充兜底政策，尿毒症只是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；这些政策也不仅是落地了虞城县的魏垌堆村，更不限于河南省，而是惠及全国。



李存希每次赶集都会给闺女买玩具，摆满卧室。
 张赫摄

一进门，就是一个有玻璃顶的院子，院子里是两把摇椅，再往里屋走，是两间卧室和客厅，院子里有小狗和小猫丝毫不怕人，厨房整整齐齐，还飘着饭菜的香气……
 这是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店集乡魏垌堆村一户村民的家，也是26岁就确诊尿毒症、开始透析的80后李存希（化名）的家。
 从14年前一个月透析需要5000多元，到现在每个月全部自费只需要1000多元，从报销比例25%到50%再到如今的80%，李存希全家亲历了医保改革落地的变化。
 李存希现在常说，人活着，才有希望。这份希望和底气，都是国家给的。

全身浮肿竟是尿毒症

2009年农历十月初九，李存希从广东东莞回到了河南老家，全家人没想到的是，儿子走的时候好好的，再回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像是充了水。如今回看，李存希还能打趣的说：“那时候，真的像孕妇。”

从前的至暗时刻，用谈笑风生的语气说出来，李存希全家的这十四年，走得并不容易。

2007年，李存希24岁。和其他年轻人一样，“想去南方，想进厂赚钱”，在东莞，他从螺丝钉厂到电梯厂，底薪450元加上绩效，每个月可以赚到手1000多元，在厂子里认识湖北襄阳的姑娘丽娟（化名）后，2008年夏天还生下一个小女儿，这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来说，生活已经很满足。

没想到2009年初开始，李存希开始全身浮肿，乏力。“前一天晚上，我还和几个朋友打球，上半场还没结束，直接就晕倒了。第二天干脆连床都起不来，到东莞市红十字医院，发现肌酐达到800多，医生当时就告诉我，已经是肾衰，终末期肾病。”李存希回忆，当时听到尿毒症和透析两个词，以为和直接被判“死刑”基本上没有区别。

2020年2月，据世界顶级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公布的《1990-2017年全球、区域和国家慢性肾脏病负担：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分析》显示：截至2017年，全球慢性肾脏病患者人数达6.975亿，其中中国肾病人达1.323亿。

对于李存希而言，从起初的排尿数量减少、到脚脖和小腿水肿，再到全身水肿身体越来越乏力，其实这中间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。

“肾病到尿毒症，如果是在不知晓的情况下发展，其实并不远。”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李明喜告诉健康时报记者，患有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病人，若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，仅仅5~10年后就会发展成尿毒症；如果是膜性肾病以及IgA肾病病人，有大量蛋白尿且伴有高血压，同样也会发展成尿毒症。所以慢性肾病到尿毒症的发展过程中，必须治疗阻断，才能减少中末期肾病的发病率。但很显然，李存希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。

“我和媳妇儿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，掐算着治病要花的钱，一次透析大概500元到800元，一周三次，一个月就是至少4500元，这是我俩当时两个月的工资。”当然，医生还给了第二个选择：换肾，需要至少50万，但对于两个农村家庭来说，无疑更遥不可及。

“看我越盘算越没底气，她啥都没说，直接和我一起辞职，但我当时说的是，你把存的钱全都拿走，把孩子养大，我的病不治了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”李存希回忆，听到这话，妻子非常决绝，直接打包行李买票，带他回到了河南老家，告诉他，无论如何，都不会丢下他。

“到家第二天，父母和哥哥妹妹一起陪我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。”李存希坐在自己院子里，一边逗着两只刚出生的小猫，一边说，从那天起，我和尿毒症抗争了14年。